

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 結構性危機

• 任劍濤

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多元為前提，也以多元為發展動力，更以多元為發展基本態勢。然而，多元僅僅是部分學者的主觀期待，而不是現實的客觀顯現。

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年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段，但是對於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則是一個決定性的時段。這三十年成為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拐點——此前，中國沒有規範意義上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以「哲學社會科學」命名的非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完全受制於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需要。一時以「封資修批判」為題的哲學社會科學，成了政治權力的婢女、階級鬥爭的工具。此後，隨着中國社會逐漸向改革開放縱深地帶的推進，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獨立性為人們所認可，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宣示、學科分際、思想主張、學術探討，顯露出一派繁榮景象。

儘管如此，從總體上講，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依然處在一個先天條件欠優良、後天發展不匹配的狀況之中。價值觀念的多元化與學術研究的多樣化雖然給人們一種繁榮昌盛的感覺，但是由於缺乏支持這種多元狀態的若干制度條件，思想學術界對於若干現代基本價值也沒有達成共識，使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整體上處於一種

結構性的危機之中。眾所周知，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多元為前提，也以多元為發展動力，更以多元為發展基本態勢。然而，多元僅僅是部分學者的主觀期待，而不是現實的客觀顯現，因此，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注定要在預支多元的條件下蜿蜒前行。

一 交疊的危機狀況

首先，讓我們描述一下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狀態。從總體上講，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在過去的三十年內有着長足的發展。一方面，它作為學術的獨立地位被承認了。關鍵的是官方鬆動了立場，讓人文社會科學具有的人文性和科學性不再屈從於政治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不同性質逐漸為人們所意識，不再將二者混為一談。人文學表達人類期待的性質愈來愈清晰，而社會科學描述並分析現代社會的特點也愈來愈明顯。

但是，因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長期處於政黨意識形態的直接支配之下，它與長期獲得國家與社會各方幾乎無條件支持的自然科學無法相提並論。如果說中國自然科學在部分研究領域還可以跟具世界水平的研究對話的話，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就只是在向世界介紹我們中國學者在做甚麼研究的地步。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發展顯然處於兩種格局——國家控制與支持的差異性非常明顯，資源的獲得與分布極為懸殊，社會的認知與認同相差極大。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自然科學同樣屈從於政治的需要，同樣沒有形成學科流派，同樣沒有支撐學術發展的學科規範，同樣沒有能夠與社會需求相互吻合^①；只是比較起來，人文社會科學這些方面的缺失，更為觸目驚心而已。

首先，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有着明顯的危機迹象，具體的表徵有六：

(一) 以知識興趣替代價值判斷。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界今天總體上表現最為令人擔憂的地方。從一般視角看，知識面對事實世界，知識問題上的公度性特點明顯強於價值問題；價值則面對意義世界，顯現為「諸神之爭」的狀態，明顯缺乏公度性。但是，一個學者的價值立場對於其知識整理具有重大制約。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來講，不確認基於基本理性的價值觀念，就無法有效地積聚知識、推進知識進步。今天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似乎在基本價值立場沒有澄清的情形下，將自己的興趣完全付諸於知識問題。知識也就成了零敲碎打、失去意義引導的自娛自樂。

(二) 以學術策略替代道義擔當。對於今天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來講，

處理轉型社會的價值問題與給出社會發展的未來藍圖，是最為重要的事務。無疑，學者無法以有限生命應對無限問題。他們有理由以最優化的學術策略獲得最令人滿意的研究成就。這就給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帶來一個兩難的問題：要麼服從社會的召喚，承擔引導社會健康轉型的道義；要麼僅僅追求以成功的學術策略獲得個人的輝煌成功。今天中國相當多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道義擔當顯然不如他們對於學術策略的關注來得緊要。尤其是一些領袖級的學者，總是關切自己在學術策略上是否優於別人，而對道義問題緘默不言。

(三) 以價值宣洩替代制度安排。而對於某些學者來講，僅僅宣示自己的價值立場成為了他們為學的唯一事務。他們懷抱着令自己感動的某種價值理念，既不與歷史連接，也不與現實掛鉤，而將其單純地與道德情懷聯繫在一起。相反，他們對於中國社會三十年變遷所顯現的制度需求熟視無睹，並且對於制度建構的呼籲者輕蔑地評價為「制度崇拜者」。其實，今天中國的制度匱乏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不過滿懷價值情結的學者不願意證實這樣的現實需求而已。這對於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講尤其是問題。

(四) 以治道設計替代政道籌劃。這主要是針對政治學學者而言的。三十年來努力切中中國轉型的政道問題的政治學學者是極少數。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樂於在治道問題表現自己的小聰明。對於那些缺乏重大現代政治意義的小改革，花費了大量的學術精力。結果總是在不斷的官式興奮中耗費了學術資源，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理論問題置諸腦後。而這種學術選擇最嚴重的後果是，它使人們以為那些具體的改革舉措，就是我們中國

如果說中國自然科學在部分研究領域還可以跟具世界水平的研究對話的話，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就只是在向世界介紹中國學者在做甚麼研究的地步。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發展顯然處於兩種格局。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總體思維還停留在革命時代，學者對於現代基本價值與現代制度缺乏理性認知與共同接納。人們還在某種對峙性的思維結構中處理自己和別人的研究結果。

人追求的現代目標，就是我們中國人實現政治现代化的實際狀態。

(五) 以靈性呈現替代歷史審視。三十年來，一批聰明睿智的學者登上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領袖級舞台。他們對於後學既具有引領能力，也具有示範作用。但是，這中間有部分學者將自己的學術靈性發揮得過頭了，以至於將自己的學術興致轉移到哪裏，哪裏就成為中國的學術熱點。加之這些學者完全有能力把學術研究當作文化產業來運作，因此，他們的靈性便成為中國人文學科轉移話題、變換領域的絕對動力。歷史精神遺失在他們表現靈性的學術領域跳躍過程之中。中國現代轉變的歷史厚重感也就隨他們的靈性起舞飛揚。

(六) 以意識形態替代學術準則。中國近三十年是一個走出僵化的意識形態、走進思想活躍狀態的時代。但是，一些學者寧願將自己安頓在僵死的意識形態的「過去」，而不願意了解和接受與轉變社會相適應的精神生活情形。他們以學術的名義將人文學者的人文情懷看作是對於政治的消解、把社會科學學者的科學精神看作是政治上的疏離甚至反叛，因此，他們以極高的政治警惕性對待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是與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交流與互動。他們在政治控制學術的天地裏尋找着自己的政治與學術的雙重位置^②。

其次，從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實際處境看，其危機狀態也非常明顯。一方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規則性建制幾乎完全缺席。人文社會科學界對學術規範的清理、對引證方式的普遍重視、反對剽竊的舉措，都證明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還在底線規則上花費着巨大功夫^③。另一方面，中國人

文社會科學缺乏說明中國當代社會變遷的理論能力，因此大面積地流失了人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信任。這中間以經濟學的處境最具有代表性。此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特殊主義取向將自己排斥在國際學術界之外，流於自說自話的尷尬。僅有一些左翼議論在與「國際」對話，或一些國學研究者與國外漢學家的交流，這是一種限於西方非主流學界的言談。總體上講，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處在國際主流學界之外。

二 多元的不期而至

但頗為有趣的是，近三十年逐漸呈現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危機狀況，與其進入多元化的狀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前者代表了一種讓人不能滿意的狀態，後者似乎合乎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潮流。造成這種矛盾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分析起來不外乎內外兩種因素。內部因素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總體思維還停留在革命時代，學者對於現代基本價值與現代制度缺乏理性認知與共同接納。人們還在某種對峙性的思維結構中處理自己和別人的研究結果。外部因素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遠遠還沒有動搖，中國古典傳統政治習性和近六十年的政治新傳統還複雜地作用於人們的思維世界。「現代」還沒有成長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傳統與現代還在主流的問題上糾纏着、焦灼着。由此，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依然處在自主發展的脫胎時期，既無法徹底告別政治新傳統促成的意識形態化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也無法根本告別傳統形態的經學思維。人文社會

科學與一個現代社會互動的思想史事件還無從發生。

於是，當人們放眼觀察今天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一個顯在的事實是，從官方的視角看，政黨—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的絕對主導地位沒有商量的餘地。從民間學術來看，沒有一種價值主張與一個學術流派足以獲得學者的普遍認同，多元價值理念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共同認可的狀態。官方學術與民間學術的割裂狀態，已經使人們明顯感覺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兩個世界業已形成。甚至官方仍然堅持使用意識形態化的「哲學社會科學」稱謂，而民間則採用「人文社會科學」的命名^④。僅就民間的「人文社會科學」來看，似乎成型的多元化，從幾個方面顯示給人們它的新面貌。

首先，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分解與功用的差異以不同面目展現出來。

人文學科的主流學科——哲學、文學、歷史、藝術，在不同的時期扮演了熱門角色。1978到1989年，哲學與文學書籍持續熱賣。哲學擔當了由執政黨而不是由學術界發起的「解放思想」的主流學科責任，而文學則充當了民間發出歷史幽怨的媒介。前者的官方學科性質一直維持得很好，但由於「西方」哲學的進入，事實上逐漸發揮了讓官方警惕的作用。後者在一個緊張的政治控制社會中，學科和創作空間一直是有限的。從傷痕文學開始，文學一直發揮着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這也促成了文學的政治品格。後來文學不得不向文化挺進，喪失了文學的固有地盤與學科邊界，根源便是文學的政治化。歷史學科因為在文革時期充當了「影射史學」的政治棍子，因此一直處於學術的邊緣地位。但在人們從歷史看當下的現實需要推

動下，「戲說歷史」竟然成為歷史學光復失地的一種有效方略。

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諸如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等，也和人文學諸學科的學術境遇一樣，在不同時期成為被熱炒的學科。社會學與人類學在1980年代熱過好長一段時間。這是一個國家缺乏整體社會認知的必然現象，只是由於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一直維持着「舶來」的學科獨立性，它對於中國人的自我理解功用還有待發揮。「經濟學帝國主義」已經是我們今天熟悉的提法。這恰好用來形容經濟學在中國社會科學體系中所處的無法企及的地位。由於執政黨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限定在經濟領域中進行的，因此，經濟學被給予了充分釋放學術能量的空間。作為近三十年社會科學發育最充分的學科，經濟學可以說是一枝獨秀了。

當經濟學終於走到了自己無能為力的產權問題上時，法學便登上了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心舞台。近十餘年來，法學家以法律文化學的方式，替社會學、人類學講了不少話；而法與經濟的學術研究，逐漸擠進了社會科學的核心圈；以憲法、行政法的研究，把政治學的話語納為己有。法學逐漸顯示出原來經濟學的學科霸主面目。唯獨政治學比較落寞。在現代社會科學體系中，政治學近年甚至處於被它的次級學科——行政學或公共管理學替代的窘境。後者沒有政治風險，前者的研究吃力不討好。但政治學的民間話語還頑強地顯露着它對於轉型中國的不可缺少。無論如何，各種學科今天的確是「百花齊放」，但實在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

其次，學者之間的價值主張已經公開亮相，而毋庸遮遮掩掩。這是今

由於執政黨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限定在經濟領域中進行的，因此，經濟學被給予了充分釋放學術能量的空間。作為近三十年社會科學發育最充分的學科，經濟學可以說是一枝獨秀了。

中國政治體制整體上沒有突破一元結構，民主建設遠遠滯後於中國社會的變化，甚至權力體系還在刻意阻擋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趨向。缺乏政治民主的社會無法真正支撐起多元主義的學術世界。

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多元化最重要的顯示指標。

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相伴而行。1980年代幾乎是一個相對主義流行的年代，這與中國告別絕對主義的政治生活方式有密切的關係。1978年以前，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大致處於一個絕對主義的精神氛圍之中。告別絕對主義，哲學居功至偉。哲學界對於人本哲學的研究、絕對主義的批判、存在主義的引介、理性主義的宣揚，促使中國走出文革的精神境地。當然，告別絕對主義就為相對主義的長驅直入洞開了大門。存在主義等非理性哲學的流行，也為非理性主義的泛濫騰出了空間。多元顯然在文化現象上留給人以相對的印象。

三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界走馬燈式地上演過各種現代價值活報劇，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紛紛登場，價值多元的景象不容分說地呈現在中國人的面前。今天人文社會科學界不同價值主張的學者，對於自己哪怕是偏離政黨—國家意識形態甚遠的價值主張，也毫不隱晦地宣示出來。從政黨—國家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原來幾乎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民主社會主義，已經堂堂正正地登上學術殿堂，甚至被視為為中國政治解套的思想方案^⑤。而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保守主義理念也登堂入室，直入學術界的核心^⑥。自由主義者發表自己關於中國政治出路的學術見解，是近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最為獨特的學術景觀^⑦。這些價值主張甚至在十年前都是中國人幾乎沒有涉足、或者只是淺嘗則止的。而那時以一個「自由化」的命名就足以將它們置之死地。

再次，學術研究的方法進路多種多樣，顯現出不同的學術研究風貌。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以學術風

格顯示出來的多元化狀態。重視思想的規範研究、或是申述學術的見解，抑或張揚西學的新奇、顯示國學的根柢，甚至是文史筆記、思想雜感，都在學術的世界中各自顯揚，競爭性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學術研究不再單純是高頭講章獨領風騷的狀況。

儘管多元化局面還不是那麼穩固，但多元化的格局似乎已經難以動搖。只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還沒有享受多元文化的資本。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與多元文化還不相適應。中國的政治狀況並不支撐多元，政治體制整體上沒有突破一元結構，民主建設遠遠滯後於中國社會的變化，甚至權力體系還在刻意阻擋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趨向。缺乏政治民主的社會無法真正支撐起多元主義的學術世界。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仍處於殘缺不全的經濟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絕對不是一個合乎規範意義的市場經濟國度，發展市場經濟最為關鍵的資源仍然由國家壟斷控制。市場經濟對於中國而言，更多的是經濟手段，而不是經濟形態。從文化領域來講，由於國家意識形態控制文化領域的欲望絲毫沒有降低，具有社會普遍認同的國家核心價值遠未能凸顯出來，社會文化的穩定多元呈現是無法期望的事情。

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之作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多元發展的三個重要支點，都可以說處於一個整體缺席的狀態。因此，多元文化主義之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進行相關研究實踐的共識，仍是一個無法完全兌現的願景。這就表明，今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是在提前享受多元大餐，但這卻是先吃後付、預支的多元狀態。今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元

情形，是一個客觀條件不足、主觀缺乏準備的不期而至的狀態。

三 開端的歷史延續

但是，畢竟中國開啟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門。1978年作為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興起之思想學術編年史的開端意義，已經獲得人們的公認。這使我們有必要在三十年的雙線反思中，追尋穩固地建立多元價值世界和多樣學術研究風格的年代學觀念。所謂「雙線反思」，一條線索是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挫折性線索，另一條則是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三個遞進時段線索。

就第一條線索來看，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進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1978年是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開端年份。1979年中共中央的理論務虛會將「哲學社會科學」補課的任務提交給了理論界。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提交，因為鄧小平提出的理論補課主要還是重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理論研究的任務一旦由政治人物提交給理論界，而不是由其個人擔任理論創造的任務，這一提交實際上就意味着向整個社會的提交。1978到1983年構成了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開端的第一個黃金時段，只是完成理論補課任務的進程非常艱難，經歷過三次中斷，即1983至1986年的「反對精神污染」、1989至1992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004至2006年的「新自由主義清算」。這三次中斷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元局面的政治艱辛。

正是這三次中斷，使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經三十年努力，仍然

徘徊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多元研究的開端原點上。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局面並沒有形成自身的歷史延續過程。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沒有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安排的有效鬆動，就無法有力推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多元研究的繁榮。存在於民間的「多元」嘗試與「多元」成就，勢必被並非主流的保守「官方」學界領導輕而易舉地抹掉。

就第二條線索分析，中國建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三個遞進時段，也顯現出明顯不同的精神氣質。過去的三十年，正好以十年為限顯現為三個時段。或許正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這種精神氣質上的變化，促成了外部感知上的多元局面。

1980年代是一個重視「思想」的年代，儘管在今天「思想時代」這樣的斷定已經不是一個讚美性的詞彙。「思想」的時代是與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狀況和精神生活情景相適應的。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是一個剛剛走出意識形態鐵腕教條主導一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時代，今天為人詬病的啟蒙主義、理想主義、整體主義、浪漫主義、本質主義等思維主宰了逐漸冒頭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但是，1980年代的「破冰」之功不能遭到忽視和否認。對於過去意識形態堅冰的摧毀、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集中批判、對於中國發展遠景的展望，集約地展現了當時中國人精神生活的面目。今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逐漸缺乏宏觀思維和思想穿透能力，缺乏相應的道德激情，不能不讓人緬懷1980年代的精神生活。一個剛剛告別集權主義、整體主義、意識形態化的時代，人們不可能一下子躍進到精雕細琢的學術世界裏去^⑥。

今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是在提前享受多元大餐，但這卻是先吃後付、預支的多元狀態。今天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元情形，是一個客觀條件不足、主觀缺乏準備的不期而至的狀態。

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
的學術始終是一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
理想境界，並不是從
事研究的所有學者都
能夠達到的水準。那
些具有原創性的思想
作品與具有深厚功力
的學術著作，都必然
出自「大師」手筆。

1990年代是一個籲求「學術」的年代。當人們以告別「思想時代」來宣稱「學術時代」到來的時候，人們是以讚許的心情來使用「學術」這個辭藻的。學術當然是以思想為支撐的，但當學術主張是以清算思想飄忽、玄妙為前提，這個時候的「學術」宣稱就具有了別樣的蘊涵。必須承認的是，1990年代是在無法延續1980年代的軌迹前行的條件下凸顯出來的年代學概念。本來，1980年代的「思想」歲月一直向前推進，一定有走到與學術並舉的可能性。但政治禁忌使思想事業夭折，誰也沒有辦法挽救。

當人們無法按照思想的邏輯審視一切權威並重置多元的時候，人們就只好將活躍的思想安頓到謹嚴的學術之中了。無論是1990年代初期《學人》集刊對於「學術」的倡導，還是19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對於「學術規範」的討論，多多少少都帶有無可奈何的政治印記。當然，這種討論本身是有其價值的——那就是在一個無法安頓現代多元價值的政治平台上，我們可以先期將一些具有規範意義的學術研究規則申述出來，也許可以將脫韁野馬式的思想先馴服一下，尤其是將意識形態不合乎思想規則的野馬套住。這個時候，對於「學術規範」的提倡，就具有了現代性含義。

世紀之交直到今天則是一個試圖結合思想與學術的年代。「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成為這個時段時髦的口號。本來，投入到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所有學者都明白，思想與學術是緊密相連的。然而，對於一個既要打破政治教條約束、又要積聚緊缺的思想資源、還要重建學術規範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來講，人們不得不漸進地、分別地完成相關事務。因此，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

學術不是一個邏輯估價的問題，而是一個循序推進的問題。這也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成長的一個獨特性質。但需要指出的是，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始終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想境界，並不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所有學者都能夠達到的水準。那些具有原創性的思想作品與具有深厚功力的學術著作，都必然出自「大師」手筆。至於資質平平的一般研究者也許能做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該受到誇獎了。世紀之交尚未出現兼得思想與學術高品質的公認作品，也許就說明了達到這一目標的艱難程度。

四 結語

從以上對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三次中斷與三個時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局面的形成會經歷一波三折的長期歷程。前者意味着政治之手對於多元格局的強勁干預，後者象徵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實踐必然經過多重試錯的選擇，才能把握到理想狀態與現實情形的結合點。就此我們可以斷言，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局面，不是研究者的主觀期待可以實現的目標，而是社會進步與研究演變兩者逐漸雕塑而成的作品。

能夠成功地建立起支持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憲政民主制度平台，既依賴於國家結構，又依賴於公共理性，還依賴於學術共同體的認可，更依賴於社會本身的發展狀態對於這種共識的客觀需求。

從國家結構的角度看，保證國家中立的憲政民主制度足以保障基於不同具體價值觀念的學者，自由地思考

他所關注的理論問題。國家不能隨意限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領域與研究論題。學者只服從學術共同體的研究規範，只能通過學術的競爭而不是政治權力的庇護來獲得學術的話語權。

從公共理性的視角看，人們要能夠放棄對於某些完備的宗教、道德、哲學學說的偏愛，要能夠在各種價值體系之間尋找到共同的核心價值，從而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上建立起重疊共識，以便提供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為寬鬆的環境。

從學術共同體的層面分析，人們必須對所有合乎憲政共識、合乎研究規範的研究成果懷抱尊重的態度。寬容的學術環境與寬容的學術品格，是鑄就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多元局面的精神氣質的學術環境。

從中國社會對於多元的制度平台的需要來審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元局面，乃是中國社會接受並維持多元的現代社會的產物。不是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造就一個多元的中國社會，而是多元的社會格局帶出一個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景象。一個建立在憲政民主制度基礎上的「良序社會」，才能造就一個多元景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狀態。一個建立在非民主基礎上的、混亂的社會局面，是不可能形成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局面的^⑨。

註釋

① 從所謂「丘成桐事件」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漢芯造假事件」等個案就可以看出中國自然科學界的諸種問題來。

② 參見任劍濤：〈學術貧困、學者自律與警察意識〉，《社會科學論壇》，2007年第6期，頁112-23。

③ 參見鄧正來：〈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社會科學規範化」討論的討論〉，載《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頁39-55。

④ 執政黨關於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決議，就拒絕採取近年國內普遍使用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說法。前一提法明顯來自執政黨一貫的指稱。它與十九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地位的認知有密切關係，也與哲學的階級性和黨派性有關。而人文學科的提法，更重視的是人文學的超越階級性、時代性的普世內涵。兩種命名也可以看出幾乎同樣「所指」的學科研究，在「能指」上的政治性差異。

⑤ 參見王占陽：〈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價值〉，《南方周末》，2007年6月7日。

⑥ 陳明主辦的《原道》，儘管經營艱辛，但畢竟生存至今。蔣慶建立儒教中國的宣誓，也在媒體上得到張揚。

⑦ 參見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這部文集彙集的自由主義論爭文章，足以顯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多元化局面正式成型。

⑧ 參見任劍濤：〈為思想申辯——關於80年代學風的反思〉，載《權利的召喚》（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頁24-37；朱學勤：〈五四思潮與80年代、90年代〉，載《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頁201-19；楊念群：〈「思想」與「學術」豈能如此二分？——就九十年代學風質疑朱學勤、陳少明兩先生〉，《中國書評》，1995年總第6期，頁61-68。

⑨ 參見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37；法伊爾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著，蘭征譯：《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頁92。

一個建立在憲政民主制度基礎上的「良序社會」，才能造就一個多元景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狀態。一個建立在非民主基礎上的、混亂的社會局面，是不可能形成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局面的。

任劍濤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教授。